



QINGNIANSHIDAI
CONG SHU

当我年轻的时候

续集

青年时代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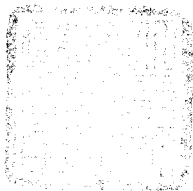
当我年轻的时候

续 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3617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23617

当我年轻的时候（续集）

本社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6插页 118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3072·614

定 价：0.93元

目 录

我的青少年时代	何长工 (3)
我的生活道路	史 良 (19)
走向光明	王定国 (35)
把青春献给党的事业	吴运铎 (45)
从家庭妇女到革命战士	陶 承 (65)
回忆南昌起义的前后	李何林 (81)
孙中山先生给我的启示	茅以升 (97)
在求学的岁月里	吴大任 (113)
兴趣广泛的青年时代	高士其 (129)
青年时期求师治学记	蔡尚思 (137)
我的青年时期	李霁野 (147)
追求	赵 洵 (157)
早期的生涯	刘海粟 (173)
我爱中华	王合内 (187)



何夏之





我的青少年时代

何长二

一九〇一年一月廿七日（农历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初八），我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大乘区南山的一个农民家庭。

华容古称泽国，为古代云梦泽的一部分。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的名句，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大泽地带浩阔磅礴的风光地势。

华容县北邻长江，东毗连岳阳，西系安乡，西南为南县，南为八百里洞庭湖。地处两湖接壤，水陆交通方便，系武汉上游九省之咽喉要冲，为历代兵家所必争之战略要地。现在仍留有当年岳飞征杨么时扎营寨的卸甲山、许家城等古迹。

旧社会华容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人称“游移之乡”。当地群众在劳动中有季节性的特征：正常年景时，他们耕田种地，下湖打芦苇，是农民和柴民；每当洪水泛滥时，就变成渔民和船民；收获季节是农民；冬天又变为盐民（贩卖食盐）。这里几乎家家都有船，人人会游水。这里还有不少外乡游民，他们大多是官逼民反的劳动人民；有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逃荒躲债的逃难者，但游民中也混有不少散兵游勇、兵痞流氓和

罪犯，为脱离兵役和拘捕而流窜到这里。此外，还有一些以抢劫为生的土匪和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这里各种会道门组织也很多，是长江以南会道门活动的中心。这些游民神通广大，他们善于勾结驻军，兵匪合一，又能适应形势不断变换面目。他们穿着军服化装为正规军，持有政府的护照和军队的委任状；换上便服又变为老百姓。这些人生死不怕，时常跟政府衙差发生冲突，有时把一营官兵缴械。你想武力围剿，越剿越多，剿不胜剿，使历代官府无能为力。据说洞庭湖的湖匪是历代王朝未能征服过的。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湖南出兵”是有历史渊源的。因此，这里又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洞庭湖原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现在的面积小于江西鄱阳湖），周围都是水网地区，这里是古代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区（何氏宗祠附近有一座小丘岭，上面曾修有禹王庙和文昌阁，以资纪念，可惜被日寇烧毁）。正常年景，洞庭湖周围华容、南县、汉寿、沅江、益阳等十二个县及湖北的洪湖、监利、石首、公安等几个县是我国产粮的重点地区，人们称为“鱼米之乡”。俗话说，“二湖熟，天下足”。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这里的劳动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农民辛勤种地终年吃不上一顿饱饭；渔民日夜捕鱼喝不上一尾鱼汤。苛捐杂税猛如虎，地主渔霸似阎王。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有个彭霸天，在洞庭湖周围又不知有多少张霸天、李霸天。俗话说，穷人无鱼不吃饭（指捕不到鱼就换不到米），富人无鱼吃得香（指每餐要有鸡、鸭、鱼、肉、蛋）。广大劳动人民终年劳累，到头来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尤其是洪水泛滥时，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当时流传一副对联：“水静沙石浪，港窄岸含舟”。社会上传说，洞庭湖区什么人最多？逃荒避难的人最多。洞庭

湖区什么样的人最坏？口吃四海，船走八方的游移人以及“当兵吃粮”的兵勇和会道门最坏，洞庭湖区什么东西最可怕？洪水成灾和兵匪勾结最可怕。

受压迫和剥削愈重，反抗斗争就愈坚决。湖南人民一贯有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光荣斗争传统，造就培养了一些著名的革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当时两湖（湖南、湖北）结成了巩固的政治、军事同盟。湖南的黄兴（字克强）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的主将。记得我十一岁时，高等小学尚未毕业，学校的语文教员唐松毓是一个文秀才，他召集主校的师生，宣传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意义，揭露清王朝腐败无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屈膝投降的罪行。当时他念了湖南省一个姓阎的都督讨伐满清王朝的一篇檄文，其大意是：大别与君山对峙，湘水与汉水共流，猛回头，曾起狂呼，洞庭波一歌同调，言犹在耳事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稚之孤何托……从这篇檄文的中心内容来看，两湖在历史上向来是结成亲密的政治联盟的。后来又有湖南要人蔡锷（字松坡）领导云南滇池起义，参加了推翻封建军阀袁世凯的斗争。当时，蔡锷摆脱了袁世凯的控制，到新加坡召集秘密会议，募捐了钱到昆明发起了滇池起义。朱德、刘伯承同志参加了起义的军事行动。这不但掀起了南方各省推翻洪宪皇帝的群众运动，而且迫使袁世凯的四个心腹即湖南的张敬尧、江西的齐燮元、江苏的李纯、浙江的孙传芳（南方的四个恶都督）也打电报给袁世凯，迫使他取消帝制。这样，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被气死了。

“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省是我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发起的中心地区之一。

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也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有三处提到华容县的工作，把华容列为开展农民运动的二等县。这主要是因为华容地处两省交界，县境内游民多，开展农民运动有死角。当时我就是洞庭湖西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中，就有两湖代表四人。湖南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有董必武、陈潭秋。伟大的秋收起义就爆发在湖南境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以及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李富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诞生在湖南。历史传言，“唯楚有才，信不虚也”（古代的楚国即湖南、湖北）。昔日之湖南为军阀混战必争之战略要地，今日之湖南已成为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二

听老人讲，何氏家族原居住在江西沱江一带。因大灾荒年，现何氏的祖先何奇挑着行李和炊具逃荒到华容泽国定居，从他起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九代了。我的祖父何学铭，祖母严氏，生我父辈四兄弟二姐妹共六人。我父亲排行第二，叫何启源。母亲陈氏（系华容县大乘区王家熬人），生我们三兄弟三姐妹共六人。兄弟里我排行第三，加上姐妹我排行第五。大哥何清，二哥丛林，大姐春姐，二姐翠姐，他们都一生务农。因终年劳累，遭受折磨，积劳成疾，在我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后，就都先后去世了。小妹九英，在旧社会也受了大半辈子的苦，直到全国解放才回到我身边生活。一九七九年，她回家乡度晚

年，一九八三年因病去世了。

我全家历代靠自身劳动维持家庭半饱的生活。由于单靠务农难以维持生活，还兼捕鱼、砍柴，冒险贩盐以贴补全家生活之不足。到我父亲这一辈，除四叔父读了几年私塾粗识文字外，其它三人基本上算是文盲、半文盲。我父亲自幼喜练武术，后来终于考上了武秀才，他就以习武和教武术为生。所以全家受尽了地主、恶霸、官吏的剥削和压迫，蹂躏和欺侮，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记得我大哥何清（当时是全家当家的）说过：“别的本事我没有，我就是能在这样的穷苦家庭里忍受社会上的折磨。挨打、受饿、坐牢房是我所习惯了的。”

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贫困家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因何氏家族有学艺工的一块公田，亦有私塾，我就于六岁时入了这所私塾。又因大乘区有公学田，办了初等、高等两所小学，故我有幸考取了南山区公立高等小学。由于平时刻苦读书，学习成绩总在前三名之列。毕业考试时全班五十多人，我名列榜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父母年迈，大哥提议我弃学务农。二嫂严氏不同意，她说，何家因没有人学文化，历代打官司都输。她决心用耕种自己的二亩棉田供我继续上学，我才得以在十三岁时（一九一四年），考入岳阳第三联合中学。不久因成绩优良，家族用学艺费送我考入了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甲种工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乙种工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中技）。何孟雄同志比我高两班。该校考试、收生很严，每个县只录取两名新生。学校是按美国学制办的，与美国订有教学技术合同。学校分三个专业，即机器制造系、纺织系、化工系。校长是蔡湘。学校有二十台机床，主要课程都由美国人用英文讲授，所学课程都要背诵，经常测验

考试。由于我努力苦学，成绩仍保持在全班前十名之列。

回顾我青少年时代的光阴，由于出身农村家庭，生活贫困，亲眼看到当时统治者腐败无能，各国的洋鬼子在中国国土上横冲直撞，任意掠夺；国内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人民备受凌侮。一种发奋学习，实业救国，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思想，一直在激励着自己刻苦攻读。小时候虽然调皮，但爱打抱不平，有时看到富家子弟欺侮穷人孩子，我就和同学们联合起来跟他们干，直到他们不敢再欺侮人为止。我喜欢音乐、体操，秉性好动，亦喜读外文。另外，我也很佩服、赞赏古人的好学。如孙康映雪、匡衡戳壁、董绅垂帷、家源绝迹、韩子焚膏，穷年勿息。古之学者，“业勤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把这些作为勤学苦练的座右铭，整天苦读古文、外文，后来又在机床、钳台上和翻砂车间里长期劳动，累得变成腰弯背不直的人。

三

一九一八年秋，我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由于长江两岸连年水灾（湖南也连续六年发生水灾），傅良佐和谭延闿为争夺湖南省主席的职位搞军阀混战，闹得湖南百姓不得安宁，百业凋零，学校快要倒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志青年也苦于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无出路。当时欧战停止，国内蔡元培、李石曾等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动员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我当时的主要思想是学好工业技术，为祖国振兴实业，发展民族工业，以达到实业救国的目的。由于我的家乡被洪水淹没，家境一贫如洗，无

法供我继续升学，因此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我便和罗喜闻、高风、毛羽顺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谋出路。先是打算到南洋去做工，后打听到蔡元培、李石曾先生等在北京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我们改变了计划，赶赴北京，进入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之一，是勤工俭学总会在一部分社会进步力量的推动和支持下，通过蔡元培先生和长辛店铁路工厂接洽开办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三日，在北京东单大方家胡同（原华法教育会旧址），由李石曾、范源濂（即范静生，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胡子静、刘文豹、王子刚、杨怀忠（杨济昌，杨开慧同志父亲）等发起，恢复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华法教育会停止了活动）。会上，李石曾，杨怀忠等名流做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等内容的报告，决定开设长辛店、保定育德中学及河北蠡县布里村三个留法预备班。后因湖南同学来的比较多，又在北京为湖南同学增设了一个湖南班。长辛店班人最多，条件也最好，学生文化程度比较整齐，外文基础比较好。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平汉铁路上由比利时、法国承办的唯一的一个大工厂，在这里学习法文和工艺比较方便。我们就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这样一方面可以接近工人，学到技术；另一方面由法国、比利时的工程师教我们机械学和法文，每月还可以拿三元光洋的津贴（当时挣三元光洋津贴是不低的）。保定班也教法文，但只有五台机床。布里村班只有一些旧的纺织机械和修理工具供学生实习使用。我和罗喜闻、周楚善、段振寰、熊世令等分在长辛店这个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学习，我们掌握了一般的实践操作技术并能够用法文说一些普通交际话了，这就为我们留法勤工俭学进一步打下

了基础。这个班讲授法文课时进度特别快。当时有个叫鲁济昌（后改名鲁易）的同志，经常来长辛店找我，想参加这个班的学习。后来他参加了学习，因为跟不上法文进度被迫转到北京班了。他从法国回来后，曾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工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三年，在湖北洪湖西南的监利县牺牲了。

我们在留法预备班除学习外，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那时白天是半天做工，半天学习，晚上就到夜校给工人上课，到工人宿舍走访，做社会调查和宣传工作。特别是那两年秋季，流行恶性传染病——“虎特拉”（即霍乱），来势猛，传染快，死亡率特别高，人得了此病不到一昼夜就死去。由于缺医少药，广大群众只好求神拜佛。我们班的同学和工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组织了长辛店铁路工厂传染病抢救队。我们在抢救中处处打先锋，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打扫街道，搞房内外卫生，去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洒石灰消毒，还要去帮助火葬死尸。干这种活特别困难，脏和累且不说，还容易传染。另外，群众迷信不愿意火化亲属的尸体，不愿意马上离开死者。我们还要说服死者亲属，及时做好隔离工作。我们没有防护设备，每人仅带一个口罩，幸好没有被传染上。由于我们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受到了群众热情的欢迎。我们抢救队在京汉、京张、京津三条铁路沿线都出了名。

经过一年多留法预备班的学习，我们便分批从北京去上海，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到达上海的（算第三批），住在法租界淞阳里。在北京学习时，我们就为出国的旅费发愁。因为当时有钱人大部分都自费出国，象我们这些穷人子弟只好设法筹公款。经过毛泽东、蔡和森，特别是

罗喜闻等人多方活动，最后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令等人手中的湖南关卡城磷矾的一笔存在北京的道圣银行（俄国银行）的粮、盐税的超额款的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我们一部分湖南同学的赴欧旅费。罗喜闻、高风、毛羽顺和我等十名湖南同学还成为范源濂先生的保送生。经过几番周折，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我们这一批一百来个同学从上海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我是学生队队长。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目的地——法国马赛港，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新的斗争生活。

四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她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她又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觉悟，正确认识革命前途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四”运动前，人民群众就对北洋军阀政府继续走满清王朝的道路表示强烈不满。《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得到传播，革命人民更加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尤其对其实行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更加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大战中出了二十万华工（其中牺牲了二万多人）和一些物质，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应当收回德国侵占中国的一切主权。但是在巴

黎和会上，北洋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却准备按照日本的无理要求，将德国侵占中国的一切主权转让给日本，并在和约上签字。这就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五四”运动爆发前，我们在长辛店已经听到卖国政府准备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消息。北京大学的学生早就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留法预备班北京班、保定班也和我们互通消息，我们班也常派人到沙滩马神庙附近（那儿是北大的斋舍）去写标语。

五月四日，以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上签字出卖山东权利为导火线，一个带着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更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天，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们怕乘火车不能准时赶到，便都骑着毛驴赶赴北京城。那时自行车是有钱人骑的，我们谁也买不起。到了天安门，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开完大会，游行队伍一起前往新华门北洋军阀政府请愿，不料遭到大批反动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刺死、打伤、逮捕。军阀政府这种反动行为，更加激怒了群众，大家立即采取行动，反击卖国贼和反动派。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们分成三路向反动派进攻：一路到赵家楼去打曹汝霖；一路到东交民巷包围日本领事馆；一路去捣毁德国牌坊（清朝卖国政府为被义和团打死的德国人克林德立的纪念碑，我们叫它“国耻纪念碑”）。我们长辛店学生参加的是东交民巷一路。事后听说，去打曹汝霖的一路没有捉到曹汝霖，就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还把没来得及逃跑、躲在曹家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北洋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更加激发了群众的斗争

浪潮。“五四”运动向着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第二天，北京市学生总罢课，开展救国宣传活动。当时成立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组织，到处演说，鼓动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在长辛店，我们也同样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工厂车间向工人宣传，到车站向旅客宣传，到近郊向农民宣传。工人们都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厂里的工程师、技师大多数也同情和支持我们。老师傅陶善宗说：“开初，我把你们当成啥也不懂的毛孩子。谁知道，你们竟敢上北京去闹总统府。”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其中工人团员有五百余人。

“五四”运动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搞运动仅靠学生的力量太单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是不行的。所以在“五四”群众运动高潮过去后，我们进一步在工农群众中开始活动，主要是搞宣传。差不多有两个月，我们没有上课，也没有做工，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三、五个人一组，到车间或农村去做宣传工作。每人每天带上几个窝窝头，早出晚归，一天要跑几十里路，到处向工人和农民演说，宣传爱国反帝，劝老百姓抵制日货，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工农群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指出国家到了危亡地步，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阶级仇恨。那时，由于反动政府的愚民宣传，广大工农群众真是只知做牛马而不问国事的奴隶，所以对我们的宣传十分欢迎。他们送水给我们喝，送东西给我们吃（我们知道群众生活困难都自带干粮）。在宣传群众的活动中，还遇到南方同学语言不通的困难。于是我们每到一地就把南北方同学混合编组，南方同学负责敲锣召集群众并写些简单标语，北方同学负